

我们需要开放式图书馆

□ 胡欣红

前几日,杭州育才中学老师储鹏翔下班回家,经过校门口时,被灯光下一个人影吸引,看到了这样一幕:一位陌生小哥从校门口的开放书架上取了书,正在埋头阅读。深受触动的储鹏翔拍照记录。

(3月31日《钱江晚报》)

在注重打造书香校园的当下,每一所学校都有图书馆,但把图书馆开到校门口的却鲜有听闻,一位陌生小哥埋头阅读的一幕更打动了许多人。

据悉,杭州育才中学于2019年在校门口家长接送等候区设立了开放式图书馆,无论是校内的老师学生,还是家长,甚至路人都能在这里看书,所以称作“共读会”。

近水楼台先得月,学生和家長当然是直接受益者。据老师们观察,最

常来“共读会”看书的,是等候孩子放学的家长和等爸妈来接的学生。平时忙忙碌碌几乎难以静下心来读书的家长,等娃放学的时间也是见缝插针翻阅书籍的大好契机。家长翻阅之后跟孩子们聊天的话题也多了不少。

在一个倡导全民阅读的年代,校门口设立开放式图书馆,其所衍生的社会效应同样不容忽视。据悉,附近的居民尤其是退休的爷爷奶奶也有不少人来看书。还有不少是在学校周边工作的人,或者经过的路人,常常能看到来这里边休息边读书的外卖小哥和城市卫生保洁人员。

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里,重视阅读是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。但在一个知识快速迭代、信息大量过剩的时代,很多人却很难静下心来阅读。

据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,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.70本,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纸质书时间为20.04分钟。

建设书香社会,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作为社会的精神高地,学校责无旁贷。开设在校门口的开放式图书馆,不仅给所有人提供了读书的机会,更是在默默涵养社会读书氛围,为建设书香社会提供坚实助力。

据悉,校门口“共读会”设立的三年多时间里,不但一本书没有少,还多了不少宝贝——老师、毕业生、在校学生会把自己心爱的图书放到这里;周围的居民也会把家里的书拿来,形成了小型的“图书漂流”。最是书香能育人,这样的开放式图书馆,多多益善。

3月29日,“浙江立法明确将禁毒知识纳入中考范围”的消息引发关注。据报道,新修订的《浙江省禁毒条例》明确,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中考范围。

(3月30日《新京报》)

将禁毒知识纳入中考范围,无疑让防范青少年涉毒更有的放矢,也有利于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。要知道,青少年的心智尚不成熟,与成年人相比,他们更喜欢尝试新鲜事物。因此,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将防范青少年涉毒的关口前置,就成为社会各界需要思考的事情。

过往的不少案例表明,青少年涉毒,一部分原因就是“赶时髦”,并以此为资本在同龄人之间进行炫耀。因此,要保护好青少年免受毒品的侵害,就需要加强禁毒宣传教育,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,打好“预防针”,让他们对毒品形成足够的“免疫力”。

在此背景下,将禁毒知识纳入中考,不失为一个具有针对性的举措。事实上,早在2015年,浙江就明确要求将禁毒预防教育知识纳入相关考纲与考题。但此次立法明确将禁毒知识纳入中考范围,更显重量级。

与此同时,这次的做法也更加注重一些细节上的要求,比如,禁毒知识的考查不设定硬性的分值量化要求,主要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中考试卷中设计考题,与相关知识的考查相结合。这样的方式让禁毒知识不再“硬邦邦”,也不会明显增加学生的学业压力,避免与给学生减负的“双减”政策相冲突。

当然,要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,不能止于将禁毒知识纳入中考,如还要明确学校的主体责任,督促学校加强管理;家长也要尽好监护人责任。另外,加大对不法分子的惩治力度,顺藤摸瓜截断毒品源等常规责任也要进一步压紧压实,筑牢未成年人“保护墙”。

要明晰的是,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教育,只有家庭、学校、相关部门等各方守土有责,形成全社会合力,才能进一步加强加强对青少年的保护力度,更好地筑牢未成年人“保护墙”。

说到底,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,考试不是目的,加强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认识才是最终目的。在我国禁毒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的态势下,通过立法明确将禁毒知识纳入中考范围,这样的“软措施”无疑可以让孩子们更深入地了解毒品的危害,有力遏制毒品对青少年的毒害。

『禁毒知识入中考』,防范青少年涉毒

戴先任

安全教育,父母也是重要『答卷人』

□ 木须虫

近日,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,对1545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57.9%的受访家长感到孩子的安全意识不够强。83.7%的受访家长对孩子学校在安全教育方面的工作表示满意。但也有68.9%的受访家长指出学校安全教育停留在理论层面,缺乏相关实操。

(4月1日《广州日报》)

从中可以看出,当前安全教育离家长们的期盼还有一定差距。与此同时,对于受访家长主观感受也需理性看待。事实上,中小學生安全意识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周期,贯穿于他们成长的全过程。此外,中小學生安全涉及方方面面,覆盖现实生活的各个场景。孩子的安全教育,不能是静态的教育,也不能只是脱离生活场景的常识教育,要从应知扩展到应会。

然而,提到中小学安全教育,包括家长在内的很多人,很容易归责于学校教育,将中小學生安全意识不够强归咎于学校安全教育不足。毫无疑问,这是很大的误区。的确,做好中小學生安全教育,学校责无旁贷。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学生的安全教育学校就可以“包办”。毕竟,学校的安全教育缺乏生活场景的实践引导是与生俱来的缺陷。

安全教育,父母也是重要“答卷人”。安全教育应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,也是为孩子成长提供安全保护的重要途径。一方面,父母要提高责任意识,不要做“懒父母”,把安全教育都推给学校。另一方面,父母要提高自身的安全常识与素养,立足于生活、置身于实景,帮助孩子“抠”安全细节,并引导他们在生活中身体力行。就拿孩子的交通出行安全来说,学校可以教会孩子识别风险、掌握规则,但具体到过马路,恐怕还得依赖于父母的引导,出现了偏差,纠一纠、念一念,远胜过课堂的单纯灌输。因此,家校合力才能更好守护孩子的安全。

“网课托娃”? 没那么省心



疫情多点散发下,陪娃上网课成了许多家庭的刚需。近日,在上海、南京等地,有酒店推出“网课托娃套餐”。套餐中的一娃一客房、提供三餐、专人陪护等服务引得家长纷纷前来咨询。且不说“托娃服务”是否合规合法,从根本上来讲,也不符合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。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把孩子交给酒店,就能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。

王铎

“低龄留学热”降温背后的理性选择

□ 刘远举

近日,胡润研究院发布了《中西合璧,文化融合——2021中国国际教育白皮书》。白皮书显示,疫情后,中国家长对子女出国留学的热情仍然很高,但年龄结构上出现很大变化。一方面,研究生阶段出国留学比例为41%,为过去5年来最高;另一方面,“低龄留学热”降温,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意愿下降五成。

(3月2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这个现象应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。

首先,高中生年龄小,自控力、世界观、价值观还没成熟,独自一人出去读书,在适应上会面临巨大挑战。

其次,中国家庭对出国留学仍热情不减,但归国就业人数上升。对于在海外就读的留学生,他们简历上的学校,只要不是名校,HR不知道,无从判断,面对那么多简历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

第一学历。既然如此,低龄留学未必对以后国内就业有很大帮助,家长们支持子女高中阶段留学的意愿就会降低。

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不断增加,家长在国内就可以为孩子选择国际教育,满足无缝衔接国外大学的需求。

此外,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是新的生育政策。本科、研究生阶段的学生,父母多半过了生育年龄,所以,生育政策的变化对其家庭开支的结构、行为模式影响不大,会继续保持原来的计划。但低龄孩子的家庭就可能选择再生一个。母亲备孕、怀孕、育儿到三岁,这个阶段必然会影响母亲的收入,同时也会增加育儿的开支。这就会影响到家庭的支出结构,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留学计划。

可以说,这些家长是非常敏感的,他们新的政策下,最早做出了反应。

一孩政策之下,家庭都把资源投入到唯一的孩子身上,哪怕明明知道其天资不佳。所以,优先察觉计划生育对未来的影响并率先采取精养、高投入、高期待模式的家长,是有先见之明的。

但现在,送子女留学,能获得的优势已经很小,海归变海带(待业)的事已经不新鲜。加之生育政策改变,多一两个孩子,将来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互相扶持,减小赡养负担、增加社会网络,进而增加收入、婚姻优势。所以,减少留学,增加子女,哪怕站在子女将来利益的角度而言,也可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率先摆脱从众行为,缩减无效教育投资的家庭,很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先拿到生育政策红利的先行者。